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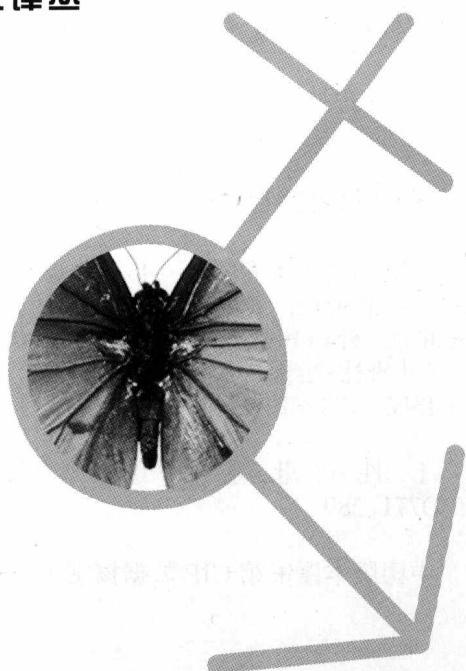
 外研社·哈佛科学人文译丛

(美) 乔安娜·迈耶罗维茨 著
王文卿 译



性别是怎样
如何改变的?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性别是如何改变的？

How Sex Changed

A History of Transsex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 乔安娜·迈耶罗维茨 著
王文卿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京权图字：01 - 2006 - 0289

Copyright © 2002 by Joanne Meyerowitz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别是如何改变的 = How Sex Changed: A History of Transsex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 (美)乔安娜·迈耶罗维茨著 (Meyerowitz, J.); 王文卿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1

(外研社·哈佛科学人文译丛)

ISBN 978 - 7 - 5600 - 6271 - 6

I . 性… II . ①乔… ②王… III . 变性—社会问题—研究—美国
IV . D771.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4339 号

出版人：李朋义

项目策划：彭冬林 满兴远

责任编辑：程 蕈

装帧设计：牛茜茜

出版发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址：<http://www.fltrp.com>

印刷：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4.75

版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5600 - 6271 - 6

定价：39.0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010)88817519



出版说明

20世纪的文化是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文化，21世纪的文化则将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高度融合的文化。这已是学界的共识之一。

秉承我社“记载人类文明，沟通世界文化”的一贯理念，我们组织翻译了这套“外研社·哈佛科学人文译丛”，目的有两点：其一，在于搭建一个阅读平台，让国际上最高端的科学教育读物能在最短时间内进入中国；其二，在科学与人文的两极之间“执两用中”，寻索那些最能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融合的优秀图书，并推荐给中国的读者。

“外研社·哈佛科学人文译丛”将涵盖在21世纪人类所无法回避的那些最基本、最重大的问题：诸如生命科学、量子力学、全球气候变暖、宇宙起源、开源软件，等等。哈佛大学出版社在世界范围内遴选的这些一流作者，将为中国的读者提供他们在这些命题上的最新思考。而所有这些思考，回答的无非是三个终极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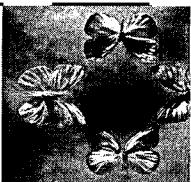
相信这套丛书将会为我们每个人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提供新的启示与灵感。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年12月

中译本序

性别是如何改变的？



正当准备说话的时候，我感到了困难，所以欲言又止。

人的言说与思考必须借助于字词或者概念。如果现有的概念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思想，或者将会在某种程度上扭曲我们想要表达的思想，我们怎会不犹豫再三呢？

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是“transsexuality”。很长时间以来，国人皆译之为“变性”。“变”字倒还贴切，关键在于“性”字。如同本书作者所说，“transsexuality”指的是“这样一种状况，处于此状况中的人皆希望改变性别的身体特征（无论一个人是否实施了变性别手术，该词均适用）”。很明显，“transsexual”（是“transsexuality”的名词形式，亦可作形容词）希望改变的不是“性”，而是“性别”，而且首先是生理性别特征，其次才是社会性别角色。

“性”在古代汉语中，从来没有被用来指称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些“性事”。在古代汉语中，也没有哪个词可以直接与“sex”相对应。最接近的是“色”、“情”、“男女”等等，但是它们仅仅指称与性活动相关的内容，而“sex”所具有的“男女之别”这层意思则是由其他一些具体的词汇表达的，如男／女、夫／妇、丈夫／妇人、父／母、翁／妪等等；而“男女”也不同于“男、女”。因此，在古代汉语中，并没有一个类似“性别”的抽象名词用以概括人类的这种区分。

以“性”来翻译英文中的“sex”乃是日本学者首创，大概是受了“食色性也”这句话的启发。在20世纪初的时候，这种译法传入我国，被我国学者普遍接受，并一直延用至今。而“性别”一词无疑是在“性”这个单字的基础上构造出来的。

在英语中，“性”与“性别”被混淆在一起。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sex”这个词具有多种含义。在流行的以及科学的话语中，“sex”不仅可以指女性和男性，而且可以指与女人、男人以及情色行为有关的特征、态度和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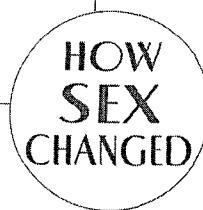
可是在汉语中（无论是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性”与

“性别”从来没有被混用。因此，根据汉语的传统，我们不应把“transsexuality”翻译成“变性”，而应翻译成“变性别”。鉴于“transsexuality”表达的是一种欲望，还应在“变性别”后加上“欲”字，是谓“变性别欲”。相应地，作为指称人的名词，“transsexual”应被翻译成“变性别欲者”，通常我们所说的“变性手术”应被改为“变性别手术”。

如此改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美国，“变性别欲”的历史是伴随着“sex”一词的含义不断演化的历史。在20世纪中叶，“sex”这个意义庞杂的概念开始瓦解。新的词义开始从学者们的书斋中走出来，社会大众接受了不同的术语，将一个含义与另一个含义区分开来。到20世纪末期，英语世界的人们关于“sex”的早期理解已经分化成三种讨论的方式：生理性别（biological sex）、社会性别（gender）和“性”（sexuality）。在翻译关键术语的时候，如果我们对“性别”和“性”不加区分，那么就很难将上述意义演化的过程清晰地呈现出来。

变性别欲和变性别欲者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20世纪初的欧洲，就已经开始有人通过激素或者手术来试图改变性别了。在中国，据我所知，早在1985年，就已经有一位男人实施了变性别手术成为女人，而且公开了自己的“变性别欲者”身份。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间，有关变性别欲的新闻报道、期刊文章、传记作品等等不断涌现。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仍然难以发现以严格的学术眼光对变性别欲进行冷静、全面考察的作品。媒体从业者往往把变性别欲当作一个能够吸引公众眼球的卖点，而一般大众则怀着猎奇的心理对媒体的炒作趋之若鹜。

上述现象其实不难理解。在美国，变性别手术的历史远比中国悠久，变性别欲者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程度远比中国深入。然而，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全面回顾变性别欲历史的著作也不多见。美国尚且如此，何谈中国。



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性”被排挤到边缘地带。而在这个边缘地带中，“不正常的”性、“非常规的”性又被打入了边缘的边缘。正因为这种极度的边缘地位，变性别欲一旦现身，便能调动人们强烈的感情与兴趣，于是大众媒体市场为此欢欣鼓舞。同样因为这种地位，它被学者们当作一个鄙陋的话题而抛诸脑后，很少有人对之潜心钻研。

然而，毕竟还有留心的人。本书作者乔安妮·迈耶罗维茨便是一位这样的学者。她以严肃、审慎而又犀利的目光，详细而又深入地分析了变性别欲在美国发展演变的历史。对于想了解变性别欲的读者来说，该书可以作为入门读物；对于该领域的专门研究者来说，该书同样提供了一个坚实的起点。

本书写的虽然主要是美国的事情，但在许多方面对于理解中国的现实具有启发意义。在阅读的过程中，若能反观一下周围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事情，你就会发现一种相映成趣之美或者产生一种似曾相识之感。这正是我向中国读者引荐本书的原因之一。

西方学界就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展开的讨论，在中国学术界已产生了重要的反响。然而，不仅中国的学者，而且许多西方的学者都认为，这方面的讨论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乃是因为妇女运动和男同性恋者解放运动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所发挥的奠基作用。

诚如斯言，但是，真正起到奠基作用的却是此前变性别欲所引发的讨论，它为此次的讨论确立了区分的框架。遗憾的是，这种区分框架建构起来的历史被众多的学者忽视了。不了解这段历史，我们就无法理解，西方学者为什么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讨论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而我们中国学者今天的讨论方式又是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上。重新揭开这段被遮掩在幕后的历史，这是我向中国读者引荐本书的原因之二。

本书是一部历史作品，但也渗透着社会学的眼光。它考察了科学、医学、法律以及大众文化之间的互动，变性别欲者与医生、

法官、学者、新闻记者以及或表示支持或表示反对的写信者之间的互动；分析了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性”和“变性别欲”在众多的权力关系中被定义和重新定义的过程。它向我们表明，所谓的“sex”、性别、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性”（sexuality）、变性别欲等等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以前看来无可置疑、截然对立的类别（如男、女）如今获得了流动性和渗透性。同样，一直为人所深信不疑的“现实”（如“我是男性”、“她是女性”等等）则因其建构的性质而失去了绝对的客观性。

“究竟”什么是“性”？“男性”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真正的”“变性别欲者”是什么样子？……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这些旨在挖掘本质的企图，既失去了意义又饱含着意义。说它失去了意义，是因为建构主义否认所谓的终极本质。说它饱含着意义，是因为挖掘本质的企图本身也参与建构了现实。无论你听到了什么（或者充耳不闻）、看到了什么（或者视而不见）、提出了什么问题（或者缄口不言）、持有何种看法（或者毫无看法），你都参与了历史（你自己的历史以及他人的历史）的构建。即使是在一个看似与你毫不相干、你甚至不曾听说的概念中，也能找到你的踪迹。从这个视角来看，媒体的喧嚣（或者平静）、读者的狂热（或者冷淡）、学者的鄙夷（或者重视）都影响了我们对“变性别欲”的看法；而我们的反应本身又继续参与构建着“变性别欲”的表现形态。如果广大读者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我将感到无比的欣慰。

强调建构主义的视角，一切事物便都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相对性，但这并非意味着取消或者否认一切坚实的东西。我们力图揭示事物背后的权力关系，但目的并非在于否认事物的可靠性，而在于更好地观察事物，以期能够以更加冷静、平和的态度对待事物。我在讲课中经常这样来解释建构主义的目标：不是为了颠覆，而是为了深入。

就弱势群体（如变性别欲者）而言，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的研究致力于打破科学、医学、大众媒体、政权、道德、宗教等等



所拥有的霸权地位，使具体的观察者能够尽可能地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看待问题，借助于一个尽可能分殊化的状态，通过种种不同的声音（包括弱势群体成员自己的声音）来维护弱势群体成员的利益。实际上，这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也就是说，建构主义者从来不标榜所谓的“价值中立”或者“公正客观”。按照我上课时常说的话就是：我的研究是具有价值取向的，我坦白交代。

希望本书能够祛除笼罩在变性别欲和变性别欲者身上的重重魅影。

有些读者或许会说，本书自身也在变性别欲和变性别欲者身上投下了自己的魅影。如果你确实是这样认为的，你完全有理由通过自己的努力祛除它。于是，新的魅影就可能诞生了。不过，无须担心，众多深浅不一、颜色各异的魅影交叠在一起，那才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怕的是色调单一、色块浓厚，无论这单一的颜色是明快的还是阴沉的。

潘绥铭

2006年4月9日

FOR PAT SWOPE
And
IN MEMORY OF IRVING MEYEROWITZ

.....
献给帕特·斯沃普并以此纪念欧文·迈耶罗维茨
.....

致谢

当决定写作此书的时候，我预计到，我将不得不在档案室、图书馆以及家里的书桌旁享受长时间的孤独。不过，后来我也发现，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其实并不孤独：在工作的过程中，我与很多的人建立了联系。朋友、同事、熟人甚至陌生人都对我给予了极其慷慨的帮助。在这里，我希望向他们中的至少一小部分人表示感谢。

我第一个要感谢的是苏珊·斯特赖克，与她进行的合作使我受益匪浅。对于历史的某些研究领域，我们具有共同的兴趣。为了进行交流，我们互通电子邮件、传统邮件或者电话，而在辛辛那提、哥本哈根以及奥克兰，我们则进行了面对面的讨论。苏珊与我进行了真诚的合作，无私地让我使用她的研究文献。她才思敏捷，常给我以启示，而她对本书初稿所做的评论也极具价值。苏珊，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在这本书中，你将会看到自己所发挥的影响。

其他的朋友和同事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我提供帮助。雷吉娜·孔泽尔、莉拉·鲁普、詹姆斯·里德、帕特·斯沃普、爱德华·康特里曼和斯蒂芬·惠特尔阅读了初稿，并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埃斯特尔·弗里德曼、谢里·奥特纳、迈克尔·格罗斯伯格和霍利·德沃尔对某些章节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评论。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乔伊丝·塞尔策通读了全文，并且不止一次地阅读了其中的某些部分。在写作过程中的关键时刻，她充分地展现了自己丰富的编辑才能。

很多人向我提供了对本书来说必不可少的资料、信息、线索、图片、剪报和引文，其中有些属于他们个人的收藏，有些是他们从正在实施的研究中搜集到的资料。我要特别感谢多丽丝·艾布拉姆森、约瑟夫·T.阿格纽、罗布·比安弗尼、乔治·昌西、利·克莱文、达拉斯·丹尼、霍利·德沃尔、安杰拉·林恩·道格拉斯、约翰·埃弗龙、吉姆·加文、卡拉·戈德曼、林恩·戈乔弗、戴约·戈尔、贾米森·格林、普雷本·赫托

HOW
SEX
CHANGED

致谢

性别是如何改变的？

夫特、丹尼尔·霍罗威茨、杰勒德·科斯科维奇、斯坦利·克里普纳、理查德·兰帕斯基、詹姆斯·洛温、R. E. L. 马斯特斯、埃利奥特·迈耶罗维茨、亨利·明顿、佩姬·帕斯科、马里萨·里士满、比恩·鲁宾逊、唐·罗梅斯伯格、莉拉·鲁普、布里吉特·索兰德、马克·斯坦、南希·斯托勒、珍妮弗·特里、南希·托姆斯、贝丝·怀特以及珍妮·扬森。我还要感谢约翰·班克罗夫特和斯蒂芬妮·桑德斯，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我才得以利用金西研究所无与伦比的藏品，并对充满魅力的当代性科学产生了初步的认识。克里斯蒂娜·乔根森的许多朋友不惜花费时间与我进行通信或通话。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布伦达·拉纳·史密斯。她不仅为我提供了重要的见解和信息，而且说服丹麦皇家图书馆开放了与克里斯蒂娜·乔根森有关的藏品，在2035年以前我将一直可以使用这些藏品。

在我全神贯注地写作此书的过程中，许多朋友和同事鼓励我，迁就我，为我提供建议，向我提出质疑，或者耐心地倾听我的意见。我特别感激乔安妮·贝尔纳普、安妮·博伊兰、爱德华·康特里曼、约翰·戴米利奥、埃斯特尔·弗里德曼、林恩·戈乔弗、C. 雅各布·黑尔、南希·休伊特、凯茜·克恩、雷吉娜·孔泽尔、戴尔德丽·麦克洛斯基、加雷·梅尼库奇、亚斯明·奈尔、谢里·奥特纳、莉拉·鲁普、克里斯蒂娜·西蒙斯、珍妮弗·特里以及戴维·西伦。此外，我还非常感谢普雷本·赫托夫特、南娜·赫托夫特、卡林·卢岑、吉特-玛丽亚·赖宁以及金·托弗斯给予我的热情帮助。与往常一样，贝丝·迈耶罗维茨对我进行了无微不至的照顾，使我有宾至如归之感。从一开始，她便对我的工作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帮助我把它（以及其他所有事情）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辛辛那提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的教职员以及《美国历史杂志》的工作人员为我的研究与写作创造了一个轻松、宜人的环境。斯泰西·布劳克曼、洛丽·克里德、柯尔斯滕·加德纳、萨拉·希思以及凯文·马什为我的研究

致谢

性别是如何改变的？

该文于1998年刊登在《GLQ：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研究杂志》上（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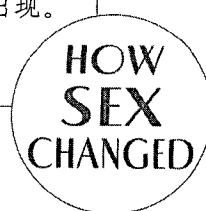
最后，我要感谢帕特·斯沃普。他对我情深义重，我欠他的实在太多。对于我们一起度过的日子，他深谙其中的诸多乐趣。

提供了卓越的帮助，而柯尔斯滕·斯特赖布和托马斯·温特则利用他们的母语帮助我进行翻译。

在准备的过程中，笔者需要查找一些不为人知的资料和尚未加工的手稿，这是非常繁琐的事情。在这些工作中，档案管理员和图书馆馆员为我提供了非常关键的帮助。在金西研究所的档案室和图书馆中，鲁斯·比斯利、玛格丽特·哈特、卡思·彭纳瓦里亚、肖恩·威尔逊和利安娜·周十分慷慨地帮助了我。在国家人文学科中心，琼·休斯敦和伊利莎·罗伯逊源源不断地把书籍和文章送到我的手中，并主动提供了一些我虽然并未要求查阅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剪报和录像带。“一”研究所的资料室如今安然坐落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而在我当初查询的时候，它尚寄寓在某游泳池旁边的一个临时处所中。那里的资料堆积如山，约翰·奥布赖恩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不厌其烦地为我查询档案，并把它们找出来，让我在阳伞下阅读。此外，我还要向下面这些人表示感谢：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诺斯奇分校的奥维亚特图书馆管理特别藏书的托尼·加德纳、纽约医学院的迈克尔·诺思、丹麦皇家图书馆的杰斯珀·杜林·乔根森和帕尔·林斯特德、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拉塞尔·A. 约翰逊以及辛辛那提大学兰萨姆图书馆的萨莉·莫菲特。

本书的写作受到了辛辛那提大学查尔斯·费尔普斯·塔夫脱纪念基金、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性”研究基金项目、国家人文学科中心人文学者国家基金的资助，我要向选择支持该研究的各个小组和委员会的成员表示感谢。在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学者基金项目的资助下，我在印第安纳大学的金西研究所住了一年（此间进行的研究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并参与了圣弗朗西斯科的一个口述史项目。苏珊·斯特赖克实施了访谈，录音带及誊出的访谈资料如今由北加利福尼亚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历史学会收藏。

第一、二章部分内容的早期版本曾在《性别变化与大众媒体：对1930年至1955年间美国变性别欲历史的一些注解》一文中出现。



引言

1952年12月1日，《纽约每日新闻》公开了克里斯蒂娜·乔根森接受“变性别”手术的消息。这则新闻登上了头版头条，标题是“前美国大兵变成了金发碧眼、皮肤白皙的美女：手术改变了布朗克斯的青年”，它向我们讲述了乔根森如何远赴丹麦去接受“一种罕见而又复杂的治疗”。乔根森生为男孩并被作为男孩来抚养，不过她却渴望像女人一样生活。多年以来，她一直在这种欲望的煎熬中苦苦挣扎，用她后来的话说，这种欲望无以言表、难以动摇而且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1950年，她乘船前往欧洲，寻找医生以改变身体所显示的性别。几个月之后，她找到了一名内分泌学家，他同意对她进行激素治疗，条件是她要配合他的研究工作。在此后的两年内，她使用了大剂量的雌性激素，并接受了两次大的外科手术以改造她的外生殖器。1952年底，《纽约每日新闻》的报道使这个不为人知的个人性的胜利变成了大众媒体中耸人听闻的事件。

最初的独家报道马上燃起了一股狂热。根据《新闻周刊》的估计，在最初的两周里，三家大的通讯社共用了五万词的篇幅来报道克里斯蒂娜·乔根森的故事。当时，乔根森很年轻，并且从传统的标准来看也很漂亮。记者们将她视为魔力的化身，就像一颗冉冉升起的好莱坞新星。他们密切注视着她在哥本哈根的一举一动，并持续不断地追踪她住在布朗克斯的父母。1953年冬天，乔根森返回美国，并沉浸在她的名声之中。翌年夏天，她开始在夜总会进行表演。这个节目很成功，在20世纪50年代余下的这几年中，她的名字一直在宣传招牌上闪烁，而她的身体则始终处在聚光灯的照耀之下。¹

乔根森不仅是一个媒体炒作的对象，一个舞台演员，或者一个崇拜的偶像。她的故事还引发了有关性别的可见性与可变性的讨论。它提出的一些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产生了强有力的反响，并且时至今日依然吸引着我们的目光。我们如何决定谁是男性谁是女性？我们为什么关心这个问题？人类真的能够改变自己的性别吗？

引言

性别是如何改变的？

性别是否并不像它表面呈现的那样显而易见？在乔根森的故事中，常规的界限被打破了，读者们为此如痴如醉，并感到惊奇。个人通过奋斗然后成功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但乔根森的故事却显得与众不同，这也极大地触动了读者。它为质疑自己性别的那些人开放了种种可能性，并为那些足不出户的神游式的旅行者提供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旅行见闻，他们还从来没有想象过人还可以跨越性别这条分水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这段历史时期，科学与性别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乔根森的故事促使一些读者自己去理清性别的界限，并使得其他一些人愿意重新思考那些他们自以为已经明了的类别。作为回应，美国的医生和科学家也开始了探讨如何定义性别的过程。

20世纪中叶，性别在美国的文化领域业已成为热门话题。几十年来，各种类型的美国人发现，他们被各种与性/性别（原文为“sex”。该词具有多重含义，既可以指与“性”有关的事物，也可以指“性别”。在作者尚未明确地区分其含义之前，译者选择将其译为“性/性别”。——译者注）的多重含义有关的新闻、调查研究、故事、观点和规则淹没了。有关性激素和性染色体的研究将性别的生物学从生殖器的可见领域带到了微观世界，而其中所蕴含的不确定性最终促使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组织去进行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探询，以决定谁可以称得上是女人、谁可以称得上是男人。就业女性数量的增长以及20世纪早期的妇女运动将性别平等以及性别差异的问题推向了政治生活的前沿，而男性以及女性同性恋亚文化的出现则使性别方面的变异现象在都市环境中清晰可见。与此同时，大众媒体使性/性别成了视觉文化的主要支撑，而对弗洛伊德以及其他性学家的通俗解读则使性/性别在心理学的现代话语中获得了公认的地位。“法定成年人”²（原文是“consenting adults”。指的是能够承担法律责任的成人，也就是达到法定年龄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成人。——译者注）的新观念是将

性/性别视为自由开放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而传统观念则依然认为性应该被束缚在婚姻之内，并将偏离期望的任何人作为攻击的目标。无论是从大的范围还是从小的范围来讲，美国社会在20世纪的上半叶都被“性化”了。

性/性别的词汇也开始发生变化。在20世纪初期，“sex”这个词涵盖了多种现象。在流行以及科学话语中，“sex”不仅指称女性和男性，而且指称与女人、男人以及情色行为有关的特征、态度和行为。为了确定性别的构成成分，人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其中一些评论者试图理清性别的特征。他们区分了四类性征。第一性征体现在外生殖器和性腺，第二性征体现在乳房、胡须，以及其他一些通常在进入青春期之后才会出现的身体差异，性冲动体现的是第三性征，第四性征则可见于性格、行为方式，甚至职业和服饰。还有人将“解剖性别”与“功能性别”区分开来，前者指的是身体体现的性别，后者指的则是男人和女人思考以及行为的方式。³尽管有少数反对者，大多数评论者都拥护生物决定论。在生物性的发育过程中，女性和男性被区分开来。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相联系的欲望和实践看来也是从这个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所有这些都被塞到了“sex”这个含义宽泛的概念之下。

到20世纪中叶，这个概念开始瓦解。专家们使用了不同的术语，以将“sex”的一个含义同另一个含义区分开来。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用“性别角色”来指称通过文化建构起来的一些行为，这些行为体现了社会对女人和男人的期望。而性研究者艾尔弗雷德·C. 金西则用“性行为”来概括种种带有性爱色彩的实践。⁴身体的“性别”不再能完满地解释“性别角色”和“性行为”。到20世纪末期，人们对性别的早期理解已经让位于三种探析的方式。

“生理性别”指涉的是染色体、基因、生殖器官、激素以及其他一些身体特征，其中有些能够改变，有些则不能。“社会性别”代表的是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以及通常与此相关的行为。而“性”

